

近代社会史角度看传统节日文化的演变

——以北京地区的传统节日为例

黄钰

(北京联合大学, 北京市, 100191)

摘要: 本文从近代社会文化史角度, 以北京地区为个案, 探讨节日文化在政治变革、社会转型与文化碰撞中的演变轨迹。通过分析晚清至民国时期传统节日的延续与调适、根据地时期中共对节日的改造实践, 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节日体系的重构, 揭示节日作为社会文化载体如何反映权力关系变动、阶层互动与城市空间的再生产。研究显示, 北京节日文化经历了从“民间自发”到“意识形态工具”的转型, 成为观察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窗口。

关键词: 近代北京; 节日文化; 社会参与; 民俗活动

一、引言

节日, 作为受众群体庞大的民族性文化载体, 既是传统文化的凝聚核心, 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领域。北京作为元明清都城及民国(北洋政府)的政治中心, 其节日文化不仅承载着多朝代积淀的礼俗传统, 更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政党政治渗透与城市化进程中呈现出独特的演变轨迹。本文以北京为样本, 通过梳理近代节日文化的变迁, 揭示其背后社会权力博弈、文化观念冲突与市民生活调适的复杂关系。

二、传统节日的延续与变革(晚清至民初)

(一) 帝制晚期节日体系的固化

晚清北京的节日体系仍以农业文明时令为基础, 依托《大清会典》形成的官方祀典与民间习俗交织架构。元宵节灯市(如东华门灯市)、清明节踏青(高粱桥一带)、端午节天坛祈福、迎春要到东直门外五里的春场, 正月绕塔要到白塔寺等活动^①, 呈现出空间分布与阶层分化的特征: 内城贵族多参与朝廷主导的礼仪性庆典, 而外城民众则通过庙会(如妙峰山)实现节日民俗活动。这一时期节日空间大多依附于城市地理格局, 如冬至祭祖集中于四合院, 彰显宗法社会特征。

(二) 民初时期的新旧节日冲突

民国成立后, 历法改革(如推行公历)冲击了传统节日时序, 但北京市民用其独有的方式去实现适应。例如, 1912年元旦活动既保留舞龙舞狮等传统元素, 又融入“中华民国万岁”标语, 形成文化过渡形态。商人群体更将端午节转化为粽子营销契机, 使节日经济功能凸显, 折射出市民社会对传统节日的商业化演变的接受程度。

三、根据地时期: 节日文化的改造与政治作用(1937-1949)

(一) 中共对传统节日的改造策略

华北根据地时期, 中共在文化领域面临双重任务: 既要破除封建迷信与旧有秩序, 又需

^① 张勃. 晚明北京居民的节日生活与城市空间的发展[J].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2011(11): 119-128.

维系民众的文化认同以凝聚抗战力量。为此，中共创造性地提出旧形式与新内容相融合的文化改造策略，通过承接传统节日的外壳与革命意识形态内核，实现文化领导权的转变。这一策略在春节习俗的改造中体现得尤为典型。

1, 拥军爱民活动

传统春节以宗族祭祀、乡绅拜年为核心，具有鲜明的等级性与封闭性。中共通过重构“拜年”仪式，将其转化为军民联谊的公共活动。1938 年春节，八路军在晋察冀边区发起“军民互拜”运动，干部战士主动为农户贴春联、扫庭院，并通过“拥军饺子宴”拉近与群众距离。此举将原本由乡绅主导的节庆转变为“军民一家”的象征，既消解了传统权威，又强化了“人民军队”的阶级属性。据太行区史料记载，1940 年春节，某村地主仍按旧俗派发“压岁钱”，八路军工作队则组织贫农子女集体拒收，转而对部队赠送绣有“为民先锋”的锦旗，使节日成为阶级意识觉醒的契机^②。

2, 新年画活动

延安鲁艺艺术家在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指导下，发起新年画创作运动。相较于传统门神年画的驱邪功能，《夫妻识字》《哥哥打鬼子》等作品以通俗易懂的构图传递革命理念。例如，《夫妻识字》描绘夫妻二人在油灯下共读《抗战日报》的场景，将知识与救亡关联，取代了门神年画中秦琼、尉迟恭的暴力形象。晋绥边区文教会议（1941 年）数据显示，新式年画在根据地覆盖率达 73%，成为传播“翻身”“生产”“识字”三大主题的重要载体。这种视觉符号的转换，既保留了年画的装饰功能，又赋予其阶级启蒙的使命。

3, 反奢崇简宣传

物质匮乏的现实与廉洁政治的追求，促使中共对传统节俗进行简化。晋察冀边区政府于 1939 年颁布《春节节约令》，限制鞭炮燃放时长、禁止屠宰耕牛，并将除夕聚餐改为“忆苦思甜饭”。太行区某村在 1942 年春节举办“算账会”，通过对比地主阶级的奢侈年俗与贫农的困苦往事，激发阶级仇恨。这种“去奢华化”实践不仅缓解了物资压力，更将节俭上升为无产阶级本色的道德标准，使节日成为意识形态规训的微观现场^③。

（二）新节日的创制与功能

中共在改造传统节日的同时，创制了一批具有明确政治意向的新节日，通过周期性的仪式来不断强化革命史观的意识。

1, “三八”妇女节：破除固有的性别偏见

根据地根据国际妇女节进行本土化，为打破性别的壁垒，1939 年晋绥边区首届“三八”纺织大赛中，参赛妇女突破千人，获奖者获赠纺车与“劳动模范”称号。太行区妇联更借机推广《婚姻自主歌》：“旧社会，包办婚，婆婆定下媳妇进门……新社会，讲自由，男女相爱才到头。”通过纺织比赛、婚姻法宣讲与识字班结合，妇女节从精英纪念日转变为大众参

^② 韩晓莉.革命与节日:华北根据地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80-81

^③ 韩晓莉.革命与节日:华北根据地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94-98

与的性别解放实践，仅 1941 年晋察冀边区即有 3.2 万农村妇女主动退婚或再婚。

2, “五四”青年节：激活青年的革命热情

中共将五四青年节与马克思诞辰整合为“红五月”系列纪念活动。1938 年燕京大学被日寇占领后，北平学生秘密集会，以“五四精神不死”为口号举行示威。根据地则通过歌咏比赛、话剧演出（如《黄河大合唱》）与军事演习，塑造“反抗一救亡”的集体记忆。晋冀鲁豫边区 1945 年“红五月”游行规模达 5 万人，标语“反独裁、争民主”直接呼应国共博弈，使节日成为动员青年投身革命的动员令。

3, 群英大会：劳动价值的主流化

群英大会作为表彰劳模的周期性集会，重构了传统的“功名”体系。1944 年陕甘宁边区首届群英会上，种田能手郝作旺获赠“特等英雄”奖状与毛泽东亲笔题词“群众领袖”，其事迹被编入《边区英雄传》广为传颂。这种将生产功绩等同于战斗功勋的做法，使“劳动”从生存手段升华为政治荣誉，据太行区统计，群英大会后参军青年中 67% 曾受劳模精神感召。

（三）庙会空间的转变

庙会作为传统宗教与民俗的交融最多的空间，成为中共文化改造的重点对象。以妙峰山庙会为例，其转型过程体现了破旧立新与渐进改良的结合。

1, 去迷信化

妙峰山娘娘庙原以祈子求缘著称，晋察冀边区政府将其改造为“抗日物资交流会”。1940 年庙会期间，政府组织农产品竞赛，设置“优产小麦”“改良纺车”展区，并邀请“识字模范”现场教学。尽管保留香客赶会传统，但通过增设“科学摊位”（如显微镜展示微生物）与“时事讲演棚”，逐步消解迷信色彩。据当年《晋察冀日报》报道，参会者中多数认为烧香不如学技术。

2, 政治融入

中共在庙会中植入军事与教育元素，使其成为革命宣传教育的学院。1943 年妙峰山庙会增设“抗日洞”（展示地雷战模型）与“控诉台”（揭露日军暴行），吸引数万群众参观。骡马交易区旁开设民兵训练角，教授埋雷、射击等技能。这种寓教于市的设计，既维持了庙会的经济功能，又赋予其政治教育价值，实现了柔性改造。

3, 策略平衡

中共对庙会的改造并非全盘否定，而是采取保留形式、置换内容的策略。例如允许秧歌队表演，但将歌词改为打倒日本鬼；默许算命摊存在，但派干部穿插讲解命运为何可改。这种策略既避免激化矛盾，又逐步引导民众对革命事业的认知转向。1945 年妙峰山庙会调查显示，大部分的参与者认可新规矩比旧迷信强，印证了文化改造的实效。

（四）小结

根据地时期的节日文化重构，是中共将文化权力转化为政治资本的经典实践。通过“旧形式+新内容”的策略，将传统节俗赋予阶级团结、生产动员与革命教育功能，新节日的创

制则构建起对抗旧秩序的符号体系。而庙会空间的改造更是展现了中共在文化领域中的治理智慧。这一过程不仅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整肃提供了范式，深刻影响了中国节日文化的现代发展。

四、新中国成立后：节日体系的标准化与政治化（1949-1966）

新中国成立后，节日体系经历了重大变革，这一时期的节日体系不仅在时间上进行了标准化，还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了政治化改造。这些变革反映了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规训和对公民行为的引导^④。

（一）节日时间的调整

北京市政府通过立法确立了新的节假日体系，这一举措对传统节日和革命纪念日进行了重新定位和调整。

1，传统节日压缩

春节假期从传统的十天缩短至三天，这一变化显著减少了人们庆祝春节的时间。同时，一些传统上被视为次要节日的日子，如正月十五（元宵节）和八月十五（中秋节），也逐渐被淡化。这种调整旨在减少传统节日对生产活动的影响，强调工作纪律和时间管理。

2，革命纪念日提升

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被提升为全民必享的假日。这两个节日不仅在时间上得到了保障，还通过组织游行训练等活动，强化了公民的时间纪律和集体意识。这些活动不仅是庆祝节日的方式，更是国家对公民行为的一种规训，通过集体活动培养公民的国家认同感和集体荣誉感。

（二）节日仪式的扩展

节日仪式的扩展是这一时期节日体系变革的另一个重要特征。通过空间规定、元素控制、媒介传播，国家对节日仪式进行了全面的控制和塑造。

1，空间规定

天安门广场成为国庆典礼的核心场域。在国庆节期间，群众方阵的整齐排列不仅展示了国家的组织能力，也象征着国家权力对个体身体的规训。这种空间规训通过大规模的集体活动，强化了国家的权威和公民的集体意识。

2，元素控制

国家对节日元素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例如，禁止民间自发庆祝活动，年画须经审查，传统的舞狮表演被改为集体秧歌表演。这些措施旨在消除封建残余，推广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节日符号和文化形式。

3，媒介传播

通过《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的示范报道和电影纪录片，国家塑造了全国统一的节日范

^④ 赵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节日在政府保护下的变迁——以苗族姊妹节为例[J].哲学与人文科学,2022(11):102-107

式。这些媒介传播不仅展示了节日活动的正确形式，还通过宣传强化了公民对国家节日的认知和认同。

（三）阶层差异的消解与重构

在节日体系的变革中，国家不仅对节日时间和仪式进行了规训，还对社会阶层进行了重新调整。

为了打破等级隔离，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平等化措施。例如，干部需与群众同吃忆苦饭，除夕时慰问工人家庭。这些活动旨在消除阶层差异，增强社会凝聚力。

尽管国家采取了平等化措施，但一些隐性分层仍然存在。例如，内部招待票（如国庆观礼）成为身份的标志，而传统的民间庙会则被降级为“民俗遗产”。这些隐性分层反映了国家在推动平等化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秩序和管理的需要。

（四）小结

新中国成立后，节日体系的标准化与政治化是国家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规训的重要手段^⑤。通过节日时间的规训、节日仪式的剧场化以及阶层差异的消解与重构，国家不仅强化了公民的时间纪律和集体意识，还通过节日活动传播了国家意识形态，增强了社会凝聚力。这些变革反映了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和引导，为新中国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从社会史逻辑看节日文化变迁

（一）从空间依附到空间生产

中国传统节日的空间形态始终处于动态演进中。明末北京灯市的勃兴最具代表性，其突破皇城礼制约束，在东华门外形成绵延二里的商业街区，这一自发性空间拓展折射出市民社会的崛起。商贩借《大明会典》未禁之隙，依托宫墙构建起“倚禁而市”的特殊商业生态，灯笼匠人沿御河搭棚，饮食摊档占据闲置官道，形成“官私交界”的灰色空间。至民国时期，北平厂甸庙会遭遇现代警务体系规训，1929年《北平特别市公安条例》划定摊位间距、限制燃放区域，传统“漫溢式”集市被压缩为标准化方块，警察手持丈杆丈量摊位的场景，昭示着国家权力对节庆空间的测绘与规训。1949年后天安门广场的改造更具象征意义，这个曾专属于帝王仪典的“天心”之地，通过拆除瓮城、拓宽通道，转化为可容纳百万人的群众集会场所。国庆游行队伍踏着金砖广场接受检阅，不仅完成空间主权的转移，更以集体的仪式重构了“人民江山”的政治隐喻。

（二）从习俗意识到政治意识

节日认同的根基发生着深层置换。明清时期江南清明祭祀，宗族通过修谱、扫墓构建九族归宗的差序格局，徽州祠祭严格遵循昭穆之序，行业神崇拜则以苏州丝业公所祭拜嫫祖、北京正乙祠供奉戏神为契机，强化行帮身份认同。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共同意识渐演变成国民共同意识。国庆游行中工人、农民方阵的整齐划一，广播体操在单位大院的同步展演，将

^⑤ 徐赣丽.当代城市空间中的民俗变异:以传统节日为对象[J]. 社会科学II辑-哲学与人文科学,2020(06):98-105

个体动作纳入国家节奏。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符号系统的革新：除夕春联从“天增岁月人增寿”转为“春风送暖党恩深”，端午香囊内增设领袖像章，这种微观物质载体的变化印证着认同转型。北京市 1958 年清明节首次组织十万市民赴八宝山扫祭革命烈士，传统宗族墓茔逐渐转变为无名烈士纪念，血缘记忆上升到国族叙事的过程，恰是通过重构纪念空间来实现集体记忆的加强。

（三）从消费形式到生产形式

节日经济属性经历着功能性颠覆。晚清上元灯市呈现典型的奢侈消费特征，《清稗类钞》记载豪商“一盏琉璃灯值百金”，姑苏虎丘曲会“缠头费逾万缗”，这种财富炫耀性消耗在根据地时期发生质变。1944 年陕甘宁边区春节运动会设置纺线比赛，将传统秧歌队转化为生产竞赛场域，晋察冀军分区更以“一斤棉花换元宵”政策激励支前生产。新中国成立后，节日彻底纳入计划经济体系，1950 年代春节物资供应实行先生产单位后居民的配给制度，1955 年国庆节开增产节约献礼竞赛”，百货公司橱窗陈列的不再是节庆商品，而是各地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图表模型。这种转变在“一五”期间达到顶峰，1956 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明确要求“把节日变成劳动日”，哈尔滨冰雪大庙会变身工业成果展，上海城隍庙灯会改为技术革新交流会，消费狂欢最终沉淀为生产动员的仪式化表达。

节日文化的三层蜕变，本质上是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传统礼俗与政治理性的交融结果。空间形态的规训重组、认同方式的代际转换、经济功能的范式改变，共同绘制出中国节日从个人角度向国家角度演变的轨迹。这种变迁既包含着现代性扩张的普遍逻辑，又凸显着社会主义国家独特的制度重塑能力，当元宵花灯化作生产捷报，庙会社火转为阅兵方阵，传统节日终在新旧时空的碰撞中重塑为新的政治文化重要体现。

六、结语：节日文化的双重性与现代困境

近代北京节日文化的演进，本质是传统礼俗与现代政制交融的过程。中共将民俗文化转化为治理资源，既降低变革成本，又实现文化领导权获取。但过度政治化导致节日失去情感纽带功能，改革开放后庙会复兴、网络购物节兴起，可视为民众对文化多样性追求的结果。当前对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复化”危机（如厂甸庙会仅存小吃展卖），警示文化治理需平衡传承与时代需求。

参考文献:

- [1] 张勃. 晚明北京居民的节日生活与城市空间的发展[J].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2011(11).
- [2] 韩晓莉. 革命与节日: 华北根据地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 [3] 萧放, 张勃. 城市·文本·生活——北京岁时文献与岁时节日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 [4] 北京市档案馆. 民国北京档案文献与岁时民俗[Z]. 1949.
- [5] 张勃. 节日生活对城市空间的影响[EB/OL]. 中国民俗学网, 2011-03-11.
- [6] 王文章.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研究[M]. 北京: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 [7] 李荣启. 中国传统节日的起源与内涵[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 [8] 赵燕.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节日在政府保护下的变迁——以苗族姊妹节为例[J]. 哲学与人文科学, 2022(11)
- [9] 徐赣丽. 当代城市空间中的民俗变异: 以传统节日为对象[J]. 社会科学II辑-哲学与人文科学, 2020(06)
- [10] 高华. 革命年代[M]. 广东: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

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e from a Modern Social History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Areas in Beijing

Huang Yu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festival culture in Beij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examining how traditional festivities transformed amid political upheavals, social transitions, and cultural collisions. By analyzing the continuity and adaptation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Republic era, the CCP's practices of festive reform in the base areas, and the post-1949 reconstruction of the festival system, the study reveals how festivals—as sociocultural carriers—reflect shifts in power dynamics, class interaction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s.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Beijing's festival culture underwent a transformation from grassroots spontaneity to an instrument of ideological governance, emerging as a critical window into modern Chinese soci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Modern Beijing; Festival Culture; Social Participation; Folk Activities